

稼轩新论

主编 刘庆云 陈庆元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稼轩新论

刘庆云 主编
陈庆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稼轩新论/刘庆云主编.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80597 - 560 - 4

I. 稼… II. 刘… III. ① 辛弃疾(1140~1207)
—人物研究 ② 辛弃疾(1140~1207)—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 K825.6 ②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114 号

稼轩新论

作者:刘庆云 陈庆元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邮编:350001)

印刷:福州市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 58 栋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30 千字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597 - 560 - 4/G · 12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

武夷山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顾问	黄启章	蔡厚示
主编	刘庆云	陈庆元
编委	刘庆云	陈庆元
	张木良	杨铭铨
	林 怡	欧明俊
	苗建青	

武夷山 辛弃疾学术研讨会与会全体学者合影
2004.4.12





开幕式主席台

与会代表拜祭铅山县
辛弃疾墓

前排左起：钟振振
刘扬忠
蔡厚示



闭幕式主席台

前排左起：林永焕（韩国）、刘庆云、王伟勇（台湾）、
钟振振、刘乃昌、蔡厚示

目 录

前言.....	(1)
论稼轩为政之“显绩”	张廷杰(3)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林 怡(16)
辛弃疾仕闽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复杂心态	刘扬忠(28)
辛弃疾“帅闽”后见四则	陈祖美(38)
焦虑:英雄情怀与孤独意识的扭结	
——辛弃疾仕闽期间创作心态探析	胡元翎(49)
辛弃疾的重农思想及现实意义	钱明锵(63)
辛弃疾与双溪楼	曹济平(71)
辛弃疾与滁州	景 刚(76)
辛弃疾与陈亮狱事	王 昊(86)
辛弃疾咏物诗与唐宋诗之流变	张高评(94)
论稼轩词的自觉理性显扬	
——兼论“稼轩体”的艺术特色 ...	朱靖华 刘彩霞(115)
略论稼轩词的原创性	周笃文(127)
从辛词看词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冲突 ...	龙建国(134)
稼轩词题材类型的统计与分析	许伯卿(141)
要写行藏入笑林	

——略说辛弃疾词中的“笑”声	侯孝琼(156)
稼轩“杂体词”探析	王伟勇(170)
青山欲共高人语 联翩万马来无数	
——论稼轩词与山	陶文鹏 路成文(192)
辛弃疾的咏秋词	朴永焕(205)
《稼轩词》的“美人”情结	舒红霞(218)
辛稼轩的“溪山”隐逸情结	陈冠明(230)
咏物词史上的别调	
——论稼轩咏物词	路成文(23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徐安琪(250)
辛弃疾“以文为词”词风的理论思考	孙 虹(263)
论稼轩词的用典	熊 笃(281)
稼轩词与《世说新语》	张海鸥(291)
辛弃疾与宋代齐鲁词坛	叶帮义(308)
刘敏中“援稼轩例”词与元代中前期词坛之稼轩风习	
.....	易淑琼 赵维江(326)
稼轩词与迦陵词之异同	梁鉴江(342)
论胡适对苏辛词的偏爱	朱惠国(351)
读稼轩词札记	钟振振(363)
辛弃疾《摸鱼儿》春词在词史上的典范意义 ...	刘庆云(375)
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	赵义山 彭天发(392)
戏曲中的辛弃疾	司徒秀英(408)

咏稼轩诗词选

陈祥耀绝句 12 首	(425)
黄拔荆词 3 首	(426)
秦惠民诗 10 首	(427)
侯孝琼词 3 首	(428)
蒋步荣诗 5 首	(429)
林丽珠诗 2 首	(430)
陶俊新词 1 首	(430)
陶先淮词 1 首	(430)
张海鸥词 2 首	(431)
马照南诗 1 首	(432)
许清云诗 1 首	(432)
张福勋诗 2 首	(432)
吴在庆词 1 首	(433)
张玉奇诗 5 首	(433)
钱明锵诗 4 首	(435)
唐鬲君诗 1 首	(436)
林 彬词 1 首	(436)
陶文鹏新诗 2 首	(436)
武夷山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庆云(438)
后 记	(444)

前 言

辛弃疾(1140—1207)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杰出的词学泰斗,历来被人被誉为“人中之杰”、“词中之龙”。他生于南宋初期,少年时代在山东历城(今济南市)度过,曾目击金贵族统治者发兵南侵的战争劫难。二十二岁高举义旗,聚众抗金,曾亲率五十骑突袭敌营,生擒叛徒,押归南宋。

辛弃疾乃历史上难得的文武全才。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在南宋四十余年,曾任职苏、皖、湘、鄂、赣、闽等地,政绩斐然,军事上亦多有建树。在文学方面,诗、文颇有可观,而尤倾其心力于词的创作,所著《稼轩词》(因四十二岁时自号“稼轩居士”,故以“稼轩”名其词集)给我们留下了800多首作品。

《稼轩词》作品之数量为全宋词人之冠,并代表了宋词发展的顶峰。词人的爱国思想,他的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他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的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他对美好大自然的讴歌,他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与关切,他对友情与亲情的颂扬,都在他的词中得到了形象的艺术的体现。正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稼轩词》善于在继承中加以创新,风格多样,异彩纷

呈,或刚或柔,或刚柔相济,或摧刚为柔,而以英雄之气融贯其中;用经用史,用诗用文,无施不可,无所不宜,自成新的格局。虽属雄杰之词,却不流于张髯叫嚣,而极显沉郁厚重。其词正如南宋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所言:“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鋗,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因此,《稼轩词》八百多年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所传诵,一直是许多诗词创作者所尊崇所师法的对象,也是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所关注的、倾心研究的重要对象。

稼轩作为杰出的爱国志士与伟大的词人,其人格精神,其思想高境,其行为实绩,为后人所景仰,所推崇;他奉献给世人的不朽作品(包括诗、文),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珍贵价值,需要人们不断地加以开掘。在这里,我们呈献给读者的《稼轩新论》,是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稼轩其人、其创作所作的新探讨,有新的开拓,新的发现,新的阐释,新的创获。书中所收录的三十多篇论文,是对辛稼轩研究的最新贡献,它们不仅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具有某种启迪作用,即对一般读者而言,亦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读性,能使人从中获得裨益。

刘庆云 陈庆元 2004年6月于榕城

论稼轩为政之“显绩”

张廷杰

摘 要:稼轩为政,始终贯彻“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的主导思想,勤政爱民,惩贪除恶,先后在滁州、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政绩突出,以致朱熹由衷地赞美他“轺车每出,必著能名;制阊一临,便收显绩。”但他也因此处境艰险,屡屡获罪罢官。在今天,我们把“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心之时,或许可以从稼轩的政绩观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稼轩;农民问题;显绩;评价

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为政者的第一要务。在阶级剥削和压迫日益深重的封建社会里,农民问题尤其显得突出。从理论上说,“民本”思想是封建官吏共同倡导和遵循的为官之道,在“民本”思想的支配下,也的确出现了不少体察民情、勤政爱民的好官廉吏,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和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低下,清官少而昏官多,廉者少而贪者多,农民问题总是十分严峻。在为数不多的好官廉吏队伍中,辛稼轩便是其中一员。稼轩为官,总是把解决农民问题做为首要政务,且为之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朱熹曾多次由衷赞美稼轩,主要是数十年同为地方任守的工作过程和私人交往当中深切认识和感受到稼轩为政之特点。稼轩每到一地,就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地解决农民问题,朱熹对稼轩的赞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他说:“伏维某官卓萃其才,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轺车每出,必著能名;制阊一临,便收显绩。”^[1]这是对稼轩任职福建时积极推行“经界”、

“钞盐”所收政绩的赞美,也是对稼轩以往帅滁、赣、潭等州时政绩的肯定。

稼轩为“封疆大吏”的时日并不多,但所到之处,恪尽职守,千方百计地解除农民沉重负担和困苦境况,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究其原因:他为政始终坚持贯彻传统的“民本”思想,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2]他始终不渝地为此而努力工作。本文将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稼轩对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南宋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北宋王禹偁在其《感流亡》、梅尧臣在其《田家乐》、王安石在其《河北民》、苏轼在其《吴中田妇叹》等诗中对民生之多艰已经感叹尤深了,但南宋农民的境况比北宋农民要糟糕得多。我们在范成大的《催租行》和《后催租行》中已经感受到农民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对租税的名目却不甚了了。南宋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就以春秋两税来说,在正税之外要加征“正耗”、“加耗”、“和籴米”、“斗面米”等,比原定额增加五到七倍,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4载:“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正税之外还有身丁钱(人头税)、“大札钱”、“纲夫钱”、“免夫钱”和“赡军月桩钱”、“经制钱”、“籴引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牛革筋角钱”、“进税钱”等等,真是多如牛毛,不可胜计。范成大《后催租行》所说的“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还有他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所写的“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等诗句,正是当时农民状况的真实写照。

稼轩对于生民困苦的认识,着眼于两个侧面:一是承受租税繁多之苦,二是官府残民害物之苦。对于租税繁重之苦,他在《玉楼春·用韵答傅岩叟……》词中曾以嘲讽口吻说:“人间踏地出租

钱，借使移将无着处。”但更为具体的描述则是在他四十岁任湖南转运副使时所写的《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

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3]

这里所罗列的“斗米面”、“折纳”、“并耗”诸苛捐杂税名目以及官府无赖强征的情节，即为当时农民必须面对的事实，稼轩所列只是部分，还不包括“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的名目。试想一个农民面对如此沉重的剥削压迫，将何以能保障生存。而官府在催逼这些苛捐杂税时全无同情体恤之意，却残暴凶狠，如狼似虎，借官府之权势，欺凌讹诈，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稼轩将其称为“残民害物”，在《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有具体记述：

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暴征苛敛，使百姓不堪重负，倾家荡产；残民害物，使百姓横遭鞭笞，无以生存。这就是辛弃疾所感受和认识到的南宋农民的生活真实。暴征苛敛、残民害物究竟给人民造成怎样的生活状况，稼轩说他“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但更为具体详尽的描述，则在朱熹的《奏救荒事宜状》中：“民情嗷嗷，日甚一

日,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予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下视其死亡者,盖亦不少。”^[4]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人民生活图景!连士子宦族三等入户都存活无计,要求跻身乞丐行列,那些底层生活的佃户们就可想而知了。百姓没有活路,只有铤而走险,难怪辛弃疾发出“民不为盗,将安之乎”的感叹。

二、稼轩“以惠养元元为意”的思想脉络

稼轩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是从宋孝宗乾道元年他26岁时进奏《美芹十论》开始的。此时,他为签判之职,虽身为幕僚无权主政,但于生民问题关系国家兴亡的道理已有清醒认识。在《观衅第三》中指出: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视,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钜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

虽然这是从准备北伐的立场出发,以沦陷区人民不满于金人统治的思想状况,证明民心可用,但其中却包含着宽解民力的思想基因。五年以后的乾道六年稼轩31岁,为司农寺主簿,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在《其七》中正面提出“宽民力”、“厚抚养”乃为“富国之术”的思想。他说:“至于富国之术,民无余力,官无余利矣,国不得而富也。”充分认识到国富基于民富,民穷国自难富的道理,指出官府若残酷压迫、苛夺无度,使“民无余力”,则国富就无从谈起。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主张“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

如此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满足将来北伐战争旷日持久所需之巨额经费。虽然辛弃疾对当时农民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不多，这些认识，也只是在理论层面的阐述，但他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盛衰的作用，是有一定高度的，也为他以后独当一面、治理一方时，始终把宽解民力当作为政的第一要务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越二年，稼轩 33 岁，出知滁州，他开始有了自主执政的权力，也开始正式接触和了解到真正的农民生活苦况。当他看到滁州市民不聊生的情景时，顿生由衷之感叹：“守土者过也，余何辞”，^[5]于是他怀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运用手中有限的职权，以安民富民为中心，全力以赴地施行了各种切实有效的政策，使滁州“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百姓安居乐业，面貌很快得到改变。这是他第一次把“民本”思想付诸实践，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他的朋友周孚称赞说：“君子之仕，凡事之在民者，皆我所当尽力也，尽吾力而不成，吾无憾焉。……故楼之役虽小，而侯之心其规规然在民尚可验也。”^[6]

孝宗淳熙二年稼轩 36 岁，出任江西提典刑狱，朝廷授予他的直接任务是节制诸军，进讨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可谓临危受命。之后在湖南等地又相继发生了李全、陈子明、李峒等农民起义，辛稼轩认真研究了这些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深刻感觉到，民之所以为盗，并非民刁，而因官贪。因此他特意写了专折上奏，对民之为盗以及与之相关的“弭盗之术”、“致盗之由”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提出了富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见解。首先探讨“致盗之由”，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如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民本思想付诸实践，就是关怀民生、体察民情，予民休养生息之利等内容，这本是儒者为官、忠心报国必然遵循的第一要务，宋名儒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尤其强调这一点，并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类的呼吁。但事实上，能真正身体力行者却寥寥无几。相当多

数的官员都是“贪浊之吏”，他们并非不懂得民本思想，只是因为贪欲的驱使，口头上高唱民本高调，而其行为不但不顾及民本，反而借合法征税之口实，巧取豪夺，满足私囊，残害黎民百姓，极尽盘剥苛夺之能事。陆九渊将这种行为概括为“张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7]。至于什么“民本”“国本”之事，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情况在陆子静致稼轩书中说得很清楚：“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8]这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官吏不择手段地苛夺百姓、残民害物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辛弃疾对此现实深恶痛绝，他把百姓为盗之事看做理所当然，大胆喊出“民不为盗，将安之乎”这种完全出自百姓心声的话。不但无深责百姓“刁蛮”之意，恰恰相反，他认为问题表现在民而根源在官。在论及“弭盗之术”的问题时，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逼民为盗的问题，只有两种办法，即：必须严惩贪官污吏，并切实施行轻徭薄赋的利民之术。他颇具意味地引述了唐太宗论盗的故事：“臣闻唐太宗与群臣论盗，或请重法以禁，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尔。当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大哉斯言。其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卒致贞观之治。以是言之，罪在臣辈，将何所逃。”这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又精切透辟的认识，只有贪官，没有刁民。自古以来，民之为盗与贪官苛夺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认识比之他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的理论层面以及在滁州实施改变“荒陋之气”时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又有新的深化与拓展。故而此后几年，他在江西办理荒政，在湖南整顿乡社、严惩贪吏等政绩中，把打击的重点始终放在贪官污吏上，收效非常好，但也得罪不少豪强贪吏，给他在官场的前途设置了重重障碍，稼轩处于“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的困境，终于罢官，被迫离开官场。

又过了二十多年，光宗临朝执政，53岁的稼轩蒙光宗青睐，任